

习仲勋创办《关中报》始末及经验

核心阅读

习仲勋不仅是陕西、甘肃两地边区革命根据地最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是关中分区的直接领导者。在主政关中分区期间，他领导和创建了中共在关中地区的分委机关报——《关中报》，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新闻宣传思想。

□ 徐 鹏 马 成

中国人民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为领导边区军民有效地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摩擦、封锁斗争，时任关中地区分委书记的习仲勋适时地创办了《关中报》。1940年4月12日，在关中地区分委的驻地——新正县雷庄塬畔的一户农家窑洞里，第一张《关中报》油印出来了。从创刊到1950年4月停刊，10年间先后印刷700多期，发行586万份。该报为四开二版的油印或石印周报，也曾出版过三日刊、五日刊和不定期刊，版数为两版或者四版。报纸紧密结合关中分区每个阶段的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被誉为“黄土地孕育的红奇葩”。

作为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斗争武器，《关中报》不仅及时、大量报道前方战况、国内新闻、国际时事，发表军事评论，还对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和民主建设等给予充分翔实报道和舆论推动，鼓舞边区军民斗志。以1947年5月30日、10月17

日以及12月9日出版的三期《关中报》为例，该报既有反映大生产运动的相关消息，也会发表如《战时要爱惜民力》《选举中的几点经验》《开展普选运动》等类型的时事评论。此外，还不定期刊发文艺副刊，主要是散文、诗歌、快板、民谣、民谚、漫画等等，以指导农民生产，促进边区文化建设。

习仲勋在领导创办《关中报》的10年生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新闻宣传思想。

一是加强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习仲勋对《关中报》采取“抓政治、严把关、多指示”等多种领导方式，狠抓《关中报》的质量，亲力亲为指导办报。他不但与班子其他领导一起对拟发表的重要稿件进行多重审定把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为了保障报纸的稿源及质量，还经常亲自动手撰写文章为该报投稿。习仲勋曾明确要求写文章、办报纸“只能遵循党的统一方针”，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和发挥党报作为斗争工具的特殊作用。根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曾给陆定一、博古分别寄送了一份《关中报》，向两人推荐其中两篇他认为“在大报也难看见的好文章”，随后转载到了《解放日报》。

二是切实践行群众路线。习仲勋曾经指出，只有坚持将共产党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宣传，对民众的呼声认真悉心地听取，相信人民群众所蕴藏的伟大力量，能够动员人民群众一块去做事情，最后都能取得胜利。反之，如果强迫或者命令，十件事情中就会有十件事情都办不成功。《关中报》在当时不仅仅是关中分区党委的喉舌，更是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代言人。所以，它“从创刊时就有二个原则：为人民，写人民，大家写，大家看。”习仲勋对报社工作人员提出办报的工作方针是：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办报必须坚持群

众路线，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他还要求报纸用老百姓的话讲百姓的事，让他们尽可能地读懂听明白。

为此，他们经常随军四处迁移，注重学习广大战士的语言，对战地实况进行通俗化报道，力求文章语言适合广大人民群众形象生动的口味，比如把做农活时“锄地挖得不深草没锄净”叫“猫儿盖屎”，把“派生的幼苗没有取掉”叫“光棍持娃”等。文章的标题也力求通俗易懂，如《文书看了报，变成牛医官》等。与此同时，报社积极提倡干部及积极分子组织读报小组，在田间地头利用劳动休息的空闲时间，让具备识字或者阅读能力的人把报纸内容读给不识字的人听。正是由于《关中报》能够大力践行群众路线，得到了边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所以该报在文教群英会上获得了边区地方模范报纸的荣誉称号。

三是高度重视培养通讯员。习仲勋把建立广泛的通讯网作为报纸深入联系群众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关中报》社建立了严格的通讯制度：一是相隔近一个月就会出版一期《通讯通报》；二是做到平均每半个月对记者复信一回，报社专门设立通讯股，尽可能地对一般通讯员的来稿进行复信；三是根据编辑计划印发“写稿要点”；四是把通讯员不能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进行不定时间地整理，整理出来的文稿作为重要的内部参考资料，等等。此外，还全力培养通讯员，利用通讯员这个纽带积极密切联系广大读者，听取和研究他们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为了提高通讯员投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报社还采取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的方式。如“1945年10月，《关中报》为了切实解决通讯员普遍存在的物质困难，每月向每一个通讯员发一支毛笔和三张白麻纸；每月还特意增加五两灯油，以便于通讯员夜间写稿”。对于表现特别优秀的通讯员，报社给予他们的

物质奖励相对而言就更加优厚了。比如“1944年10月，《关中报》模范通讯员包柯岗作为获奖代表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不仅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还被授予个人甲等奖，奖励他一块毛线毯子、一件毛衣和一双棉鞋”。正是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激励下，许多以前不识字的农民群众都开始积极撰写新闻了。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1月至8月有636人共计投稿2568篇，1945年7月至次年2月，投稿的通讯员人数达856人。该报能够成为边区地方模范报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普遍的通讯网，并深深植根于本地干部和积极分子中间”。

四是积极发挥新闻宣传的教育作用。习仲勋特别重视新闻宣传的教育作用，将动员群众即向人民群众开展宣传作为边区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他曾在一封贺信中指出“报纸是什么？是一种工具……是指导工作的工具，也是指导干部学习的工具”，“是很好的一个学校”。他不仅是这么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1941年6月末，作为法西斯主要成员国的德国向社会主义苏联发动战争侵略，第二师范学校的师生对这个重大国际事件在认识上出现了很大分歧。当时兼任这所学校校长的习仲勋迅速带着《关中报》主编胡炎骑马赶回学校，为全体师生开展了专场形势分析报告，很快澄清了他们模糊、错误的认识，这对于正确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以及发展前途起到了重要的教育启发作用。

习仲勋以共产党政治家和革命家的风范，恪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以及正确的方法成功创建了《关中报》，这既为其主政关中分区期间的动员和教育群众、鼓舞军民斗争的积极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实践经验。

史海拾贝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撰写的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军事论著。在抗战全面受挫，危及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1938年5月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系统总结古今中外战争尤其是全国抗战初期的经验教训，鲜明提出了持久战的光辉思想，为全民抗战点亮了一盏思想明灯，照耀着通往抗战胜利的征途。8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论持久战》，仍能体会到它真理的光芒和不竭的力量。

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论持久战》一经问世，就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后来成为国共两党两军领导抗战的共识。它的发表就像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迷雾，在延安引起轰动，很快就被油印成册，在党内传阅，在传播到各个根据地后，成为我党我军树立信心、指导抗战的纲领。武汉会战结束后，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周恩来第一次向时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介绍了《论持久战》。白崇禧进行了认真研读后，不禁拍案赞赏：“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宏略！”他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将该书主旨概括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两句话，呈送蒋介石核准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指导全国抗战的最高战略方针。

《论持久战》以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和惊人的科学预见，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英明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即战争发展要经过艰苦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最后才能到达并且定能够达到战略反攻。同时阐明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彻底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澄清了党内外在抗战问题上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给全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文献，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最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检验雄辩地证明了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设想的那样发展的。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持久战思想的伟大胜利。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

《论持久战》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著作，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和指导中国抗日战争具体实践的光辉范例。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弱胜强的武装斗争经验，是人民战争理论的经典之作。《论持久战》关于战争规律的分析，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关于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理论，关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策略方针，关于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的战略原则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

《论持久战》也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范例。它关于客观地全面地分析战争的思想，关于强调在战争中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促进矛盾转化的思想，关于运用对立统一观点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思想，关于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关于人与武器辩证关系的思想，关于着眼中日双方全部基本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方法论，关于预见中日战争在时间和空间发展变化的方法论等，处处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动发挥和发展。

对外国军事斗争实践和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持久战》于1938年7月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全文刊发，随后就有中文和英文单行本在国内外广泛发行。它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军事理论，而且受到国外的高度关注，有力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向前发展，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许多亚、非、拉国家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作为反帝、反殖的民族革命的实践指南。越南前党政军领导人武元甲曾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于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有着重大的贡献。在非洲，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人民运用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开展游击战争，最后获得了民族独立。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还对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具有促进作用。

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有力思想武器

纪念《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

□ 李志萍

《论持久战》在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后，欧美等国普遍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其中《论持久战》最受欢迎、反响最大。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国际战略专家基辛格在所著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写道：“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显而易见，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里所制定的战略，几乎被完全地运用在朝鲜战争中。”一些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代表作中，如英国的《战略论》（利德尔·哈特）、美国的《大战略》（柯林斯）、《军事战略》（美国陆军学院编）、《明天的战争》（鲍德温）等融进了许多《论持久战》中的重要思想，改造西方传统的军事理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

对研究和指导当代战争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论持久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战争的根本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制定了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导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其军事价值并没有过时，对于我们考察和指导当代战争问题，实行信息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指导未来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转型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持久战》中关于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观点，为我们客观而全面研究当代战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关于人与武器辩证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战争中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关于科学的战略预见方法，对于我军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要，探索和研究信息化战争的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战略指导。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为我们探索和发展新时代人民战争理论，指导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实行人民战争，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 陈锦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根植于我国土壤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命运、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在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丰富并趋于成熟，构成了我们党和国家制度的一大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

“五一口号”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关键抉择。蒋介石反动政权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撕毁践踏“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并对和平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逐渐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纷纷愿同中共加强合作。1948年，随着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为顺应各界期待，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了“五一口号”，向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伟大号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响应，他们先后发表通电、宣言、声明或通过决议，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政协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确立。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

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45个单位的662名代表济济一堂、共商国是。毛泽东满怀豪情地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新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和国都、纪年、国旗、国歌等四个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了国家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国务院组成人员。新政协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诞生。

“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内一部分同志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一些不同看法，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的”的精辟论述，并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及时做工作保留了八个民主党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针对民主党派是否还应继续存在的争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明确回应，指出不论过去还是将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党的八大正式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立为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明确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从而突破了苏联“一党制”的政党模式，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

以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逐步规范化、程序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各民主党派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1月，胡耀邦在第15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要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确立为新时期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1989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走上了制度化发展轨道。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有了宪法依据。党的十六大后，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法规，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不断臻于成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

开来，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内涵、制度特色和时代价值。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首次将民主党派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同时搭建更多平台，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党制度模式，要着力提升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在2018年年初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了“四新”要求，即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政协联组会时，从代表性广泛性、利益整合性、治理有效性三个维度，再次系统阐述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别于旧式政党制度的优势和特点。这些思想观点及时回应了长期以来对我国政党制度的模糊认识和广大干部的热切期盼，有力解决了制约多党合作事业创新发展的重大认识问题，为新时代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建视角